

【近代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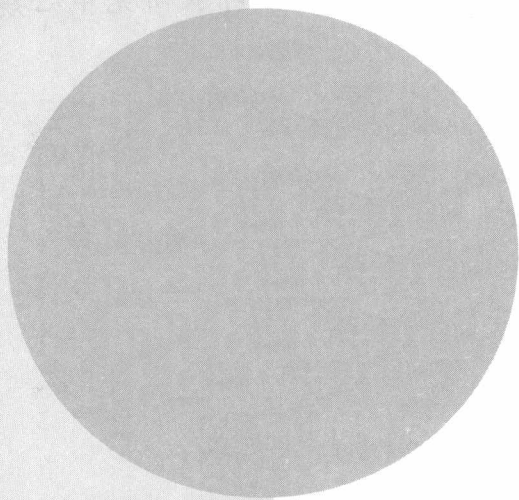
汪龙麟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近 代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近代卷/张燕瑾, 赵敏俐丛书主编; 汪龙麟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③汪… III. ①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54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近代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汪龙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贾连凤 王 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 33

字 数 / 58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 (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汪龙麟

一 空前繁荣的文学创作与相对滞后的学术研究

与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创作相比，近代的文坛确实可谓繁花似锦、绚丽多姿。仅就数量而论，这近 80 年的文学“产量”足令人为之惊叹。

就小说而论，阿英《晚清小说史》论及其时长篇小说时云：

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始终没有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①

查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共收创作小说 462 种^②，翻译小说 608 种，两者相加已超过千种。另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仅 1900~1911 年间，便收创作小说 500 余部^③。至于短篇小说的“产量”，据现存报纸、杂志、专集的不完全统计，约 6800 篇^④，这也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

近代的戏曲创作，也同样“产量”极高。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共收传奇、杂剧、地方戏、话剧 161 种，但阿英所收仅限于 1901~1912 年即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作品。赵晋辑《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报刊发表的戏曲剧作编年》，收 1896~1911 年报刊发表剧目共 169 种^⑤。梁淑安、姚柯夫《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简目》收属近代之作者 234 种^⑥，而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属近代的传奇、杂剧 542 种^⑦。

尽管传统诗文创作，宋后便日渐凋零，但近代诗文创作却呈现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有作品传世的近代诗人在千家以上，诗作数十万首^⑧；词作数量也很可观，叶恭绰《全清词钞》收清代词人 3196 家，其中属道光后词人 1300 多家，词作在十万首以上^⑨。至于近代的散文，当也在千家以上^⑩。

比起此前的中国文坛，近代文学创作的确分外活跃，各体文学均可谓“空前的繁荣”。但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学界研究的共同繁荣。据裴效维、张颐青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一书，著录 1840~1990 年间有关近代文学研究单篇文章目达 10200 条^⑪。仅从数字看，这一数目并不算少，但如果考虑到这万余篇论文的时间跨度达 150 年，平均每年论文数仅 68 篇，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平均每年研究论文数都在数百篇以上相比，近代文学研究的万余篇论文就未免有些相形见绌了。

缘何近代文学的丰富藏量，却未能吸引学界的学术目力？这其中的原因自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几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则是材料不易得。近代中国八十年，战乱频仍，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大量作家作品的流失和散佚，这必然给研究者搜集研究材料带来不少困难。再则是佳作实难求。近代的文学创作量高而质低，可说是其时及此后学界论者之共识。诗文小说戏曲几乎都表现出浓重的政治化倾向，仿续文风弥漫文坛，粗制滥造之作比比皆是。与前代文学多大家经典之作相比，近代文学中经典作品确乎少之又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学界研究情绪的淡漠。三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军和现代文学的始脉，中国近代文学的过渡性介质导致学界对其研究的颇为尴尬的抉择。古代文学研究者因其文学表现不够古雅而多不愿涉足其间，现代文学研究者则又因近代作家的文学观念不够现代而弃如敝屣。甚至有人倡导近代文学分属论、近现代合并说。前者如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学史多喜将辛亥革命前的文学归入“清文学”，民元后的文学并入“现代文学”，如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25）；后者如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局，1930），则将晚清民国以至五四后文学统归于一论。这两种做法的隐含判断显然是对近代文学是否具有独特文学表征的怀疑甚至否定。

二 近代文学的学科化进程与老一辈学者的奠基之功

尽管中国近代文学在学界并未激起多少波澜，但因此而否定学界于中国近

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失偏颇的。裴效维、牛仰山《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一书，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段，并仔细排比了每一时段学界发表的论文数量，即1920~1949年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单篇文章2909篇；1950~1979年为“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单篇文章1435篇；1980~1998年为“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期”，其中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单篇文章达到5203篇，90年代大约2000篇。依据论者对这三个时期的考察，得出两个结论：其一，“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差强人意，中期成绩最差，后期成就最大”；其二，“经过八十年的研究，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兄弟学科相比，仍然是落后的学科，不仅落后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而且与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也有差距”^②。裴、牛二人之论，颇为系统地勾勒了近代文学学科化的历史进程，而该书对每一时段的具体进展情况、不同学者的见解成就均有细致的描述，此不赘论。

中国近代文学学科体系的日渐完善，与老一辈学者的辛勤拓植和耕耘是分不开的。略一检视，不难发现，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园囿中，不乏大师名家，诸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汪辟疆、胡先骕、阿英、钱穆、钱钟书、孙楷第、容肇祖、吴文祺、李何林、任访秋、萧善因、陈汝衡、陈则光……他们所著论文，或着眼于近代文学的总体宏观描述，或倾力于近代作家作品的微观阐发，几乎涉及近代文学研究上的所有课题，尽管囿于资料和方法上的局限，所持观点亦颇多粗疏失检之处，然而，正是这些前贤先哲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为近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拓了无限的空间。

正是出于对前辈学界耆宿丰硕成果的景仰，也考虑到当代学界近代文学研究者资料取择的方便，故我们从1919~1990年间发表于各种期刊和报纸上的有关近代文学研究的近万篇论文中，选取前辈学者颇具影响的研究论文40篇。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论述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近代文学学科特征的总体性描述。其中胡适、胡先骕、李何林、陈则光四人的论文颇具代表性，四文于近代各类文体都曾涉及，但给人感受最深的则是他们试图把握近代文学总体特征的不懈努力。

胡适定稿于1922年3月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1872~1921年50年间的中国文学视为一段独立的文学史，之所以将上限定为1872年，因为这一年是“曾国藩死的一年”，而曾国藩作为“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他

的死亡标志着“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胡适认为这 50 年的文学表现出三个发展趋势，一是“古文的衰亡”，二是“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三是“近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⑩。胡适在文中并未给这 50 年文学一个合适的名称，时段上下限的界分与后来近代文学年限的划定也出入甚大，但胡文毕竟敏锐地感受到这 50 年文学已表现出与古代文学极不相侔的风范，并将之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文学时代。对此后学界建构近代文学史的学科体系是颇具启迪意义的。

然而，胡适出于宣传白话文学的需要而将古文学贬为“死文学”或“半死文学”，将白话文学誉为“活文学”，并以之作为这 50 年文学与此前文学区分的标志，这种观点自难免偏颇，在其时便遭到学界的严厉批评，如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对胡适提法即大不以为然，以为“胡君死活文学之说，毫无充分之理由”，但胡先骕所着力强调的也不过是古文学仍有其生命力，算不得“死文学”，“何况白话文已有就衰之象耶”？^⑪

二胡之争其实还只是其时白话文言争端的延续，故二者之文也主要只是依据各自的文体追求而取择材料，如胡适文中于近代小说多所褒扬，胡先骕文中则于近代桐城古文之“优点”激赏不已，虽也都涉及近代文学某些方面的特点，但毕竟只是云龙鳞爪之见，于近代文学之总体特征的把握终嫌隔膜。这种状况在 50 年代后得到了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的历史概念已逐渐为学界所认同，应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总体特征也就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鉴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在学界获得广泛深入的运用，故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反映学角度阐释近代文学特点，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何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二文。

李何林文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可说是“这个时期文学的特点的最好说明”，“这个时期中国文学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学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文学战线上和表现在政治社会战线上都同样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改良主义是这两条战线上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反帝反封建和要求民主都不够彻底，因而文学上的成就也是不够大的”^⑫。陈则光文也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述，认为近代中国文学的特点有五：其一，“中国近代文学对中国前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作了相当全面的反映，而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学

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其二，“文学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中国全部文学历史”。表现在近代中国文学领域，便是“新旧文化的斗争”，即“中国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新旧文学的斗争，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学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学思想矛盾斗争的表现”。其三，“这一时期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表现得相当强烈”。其四，“文学语言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展开了接近通俗化的文体革新运动，即白话文运动”。其五，“创作方法方面，除继承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外，并开始接受外国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⑩

李、陈之文从阶级分析角度的阐释，固有其弊端，但却准确地把握了近代文学发展的脉搏，尤其是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文学发展的潜在影响，较之胡适、胡先骕的文体批评自要深刻得多。

其次，是对近代各类文体、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的综合研究。这其中的代表性论文如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徐蔚南《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杨世骥《戏曲的更新》、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徐佩珩《谈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这些论文多是以某一文体或某一流派为论述中心，突出特点是视野宏阔，视角独特，持论公允且多所发明，许多论断对今天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仍不乏开启意义。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一文颇具代表性。汪文首先对“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之诗学变迁”予以分期，认为“清代之诗，约可分为三期：曰康雍，其初期也。曰乾嘉，则中期也。曰道咸而后，则近代也”。初、中期诗作“无自成风会之可言，即无真确面目之可识”，而“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当在近代”。继而将目光凝聚于近代诗家。论者先从时世递进角度将近代诗歌发展“析为道咸与同光二期分论之”，既强调政治风云对这两期诗人之影响，也兼及诗人诗学取向之不同和卓犖不群者的特异成就以及不同诗家流派之发展，重在突出近代诗歌发展演进之轨迹，并由此为近代诗歌于清代诗歌发展史上之地位寻求合理定位，指出：“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接着论者以主要篇幅从地域空间角度评述近代诸多诗家，认为“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⑪六派的划分，虽不能囊括所有近代诗家，然却凸显了地域文化渊源于诗家创作之影响。这种论述设计，既关注时间层面的历史纵向演变，又注目空间层面的水土风俗熏染，经由论者这种大范围的时空交织式的论述整

合,近代诗歌演进之规律、不同诗派之表征甚至不同诗人之风格表现等等,均得到了比较系统、科学的评述。

其他如杨世骥《戏曲的更新》、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二文,对近代戏曲演进历程的描述,徐佩珩《谈鸳鸯蝴蝶派小说》对近代小说发展的探讨,其中颇多富有价值之见解,不少资料也是弥足珍贵的。

再次,是对近代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最多,本书共选有30篇。这些论文多是择取近代某一作家或作品作单一性的专题研究,无论是考证作家生平本事,还是阐释作品内蕴的思想以及艺术表现技巧,均要言不烦,一矢中的,超越前人,影响后学。这里仅以季镇淮《龚自珍简论》、孙楷第《关于〈儿女英雄传〉》、王璜《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三篇文章为例予以说明。

龚自珍研究一直为学界所瞩目,然1980年代前,除朱杰勤《龚定庵研究》^⑧、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⑨等少数几篇专题论文外,相关论文著述的评析多甚为零碎。1980年代后,龚自珍研究虽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见解超卓者并不多见,唯季镇淮《龚自珍简论》一文,虽简略却颇为深入地探析了龚自珍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季文首先通过对龚自珍生平经历的检视,认为:

从龚自珍早年的社会批判论和改良论,到中年以后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可以看到他的从自发到自觉的进步思想斗争过程。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既以历史家自处,看到一切故纸文物的有用,随着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搜罗文献”自慰。……这就是他中年以后所以感慨日深的缘故。他的思想复杂而矛盾,烦恼和痛苦,使他不得不“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龚自珍又决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与江居士笺》可以窥见他对佛教持保留态度,因为他无法排除外缘的干扰。

这种解释较之单纯以“进步”或“落后”对龚氏思想贴标签式的批评自要深刻得多,也更为贴近龚氏思想之实际。对龚自珍的诗歌创作,文章指出:“龚自珍的诗和他的先进的思想是统一的。他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模山范水的沉寂的局面。他的诗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或政论

家的诗。”^②从龚氏思想对其诗作的影响角度并将之置于清诗发展史的高度予以褒扬，与前人多从否定角度批评龚诗多“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也判然有别。此外，季文还对龚诗之艺术创新，龚文、龚词之成就等等，均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其中亦颇多创新与发明。

“用目录之学做基础”的孙楷第，被胡适誉为“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③，其《关于〈儿女英雄传〉》一文，以扎实的目录学考据功夫，认真考核了《儿女英雄传》之版本流变情况，作者文康及其家世，以及评者“还读我书室主人”的真实身份等等，而且对小说“故事及人物”也别有慧心，如评述十三妹，认为其“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想作夫人，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异。”尽管孙氏对此感到“殊不可解”、“真是怪事”，但却敏锐地感受到了十三妹形象的前后不一致。为解开这一谜团，论者又将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的侠女十一娘和王士禛《剑侠传》中的“骑黑驴的怪女子”，与十三妹两相比照，竟然发现“原来小说前半部的十三妹的人格，是从说部中抄袭而来；后半部的十三妹，才是作者理想与经验的人物。这无怪其不调和了”^④。这种阐说未必确当，但却为此后学界探讨十三妹这一侠女形象的文学渊源着了先鞭。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蓬勃发展，各种“改良群治，唤醒国魂”的“新小说”纷纷登台，尤以“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⑤的“社会小说”最受欢迎，其中最有名、成就最高的便是被鲁迅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对这一类型小说的文学渊源和叙事特征，学界多强调《儒林外史》的潜在影响。如胡适即认为，就结构看，“《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⑥而对谴责小说的谴责倾向，也都提出严正批评。浴血生即云：

社会小说，愈含蓄愈有味。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然而作者未尝落一字褒贬也。今之社会小说夥矣，有同病焉，病在于尽。^⑦

《儒林外史》用笔之妙，在于其不着一字褒贬，而其意自见，故“含蓄”、“有味”；今之小说“病在于尽”，不留给读者一丝回味余地。换言之，《儒林外

史》写人写事，十分只写八分，还留二分给读者；而晚清诸“社会小说”则十分写到十二分，夸张失度。所以鲁迅讥之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⑧。

针对学界的这些看法，王璜《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一文，表达了不同看法。王文主要探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这三部晚清小说与《儒林外史》之间的关系，认为：

这几部书与《儒林外史》，是有着难以分开的连续性，是清代覆亡史的续编。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不是模仿《儒林外史》，而是发扬《儒林外史》的战斗意志，完成清代覆亡史的纪事。健全讽刺小说的创体，并充实了讽刺小说的形式，修正了讽刺小说格式的缺点。

因此，论者不同意胡适以这三部晚清小说为《儒林外史》产物的看法，也不同意鲁迅视三部晚清小说为“谴责小说”的论述。从形式上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其二十年中所见所闻，因而各种事体，较之《儒林外史》易于联系”。《孽海花》以傅彩云为线索，“较之《儒林外史》没有确切的主人公显得较有条理”。至于《官场现形记》，其“在故事的连贯上”，也“比《儒林外史》显得较为紧密”。因此三书“虽然都采用了吴敬梓的创体”，但却又都“给这种格式一番精巧的修饰”。至于三书的讽刺笔意，虽都不免“夸大其词的刻薄”，但如果考虑到三书作者“为着强调清代政令不修，贪污横行，使读者的印象更加深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反对他们的有意渲染”^⑨。在整个文坛对谴责小说多所指责的批评潮流中，王文观点可谓是空谷足音，而后世学界对王氏观点不仅颇多支持者，且多所丰富和发展。

此外，缪钺对郑珍诗的解读，郑振铎对梁启超的研究，葛贤宁、王瑶等对黄遵宪诗歌成就及爱国精神的挥发，曲六乙、席明真等对近代戏曲文学的批评，容肇祖、严薇青、张毕来等对近代小说的研究，均卓有成就，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最后，对本书选取论文的原则稍作说明。

（一）本书所择论文，撰者均为已谢世之老一辈学者，存世学者论文，一概不录。

（二）本书原则上只选取公开发表的论文，单行本的论著及篇幅过长者一般不予收录。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系从《胡适文存》中移录。而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一文，因篇幅过长而被迫割爱。

(三) 所选文章按类编排，每类文章一般又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以作家生卒年代为序，同一作家的文章亦按发表年代先后为序。

(四) 所选文章一般尽量保持原貌，不做任何更改。但对明显的错别字、异体字，则予以修正。

鉴于编者所见资料有限，本书的编录定有不少缺点和遗漏，恳望大方之家见谅并指正。

2005年6月20日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页。

②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④ 参见方正耀《论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⑤ 赵晋：《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报刊发表的戏曲剧作编年》，《戏曲研究》第6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⑥ 梁淑安、姚柯夫：《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简目》，《文献》第6、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1981。

⑦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⑧ 参见郭延礼《近代六十家诗选·前言》，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

⑨ 叶恭綽：《全清词钞》，中华书局，1982。

⑩ 参见黄征《近代诗文集的史料价值及其他》，《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⑪ 裴效维、张颐青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30卷，上海书店，1996。需作说明的是，此处所举论文数字，系据裴效维、牛仰山《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一书的统计。

⑫ 裴效维、牛仰山：《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第21~22页。

⑬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⑭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第18期，1923年6月。

⑮ 李何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新建设》1954年第10期。

⑯ 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1、2期合刊。

①7 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①8 朱杰勤：《龚定庵研究》，《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

①9 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

②0 李镇淮：《龚自珍简论》，《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②1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载孙楷第《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是书原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于1932年6月出版。

②2 孙楷第：《关于〈儿女英雄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号，1930年12月。

②3 《小说丛话》中使人语，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

②4 解弢：《小说话》，中华书局，1919。

②5 浴血生：《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2卷，1903~1904，此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②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鲁迅全集》（9），第282页。

②7 王璜：《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东方杂志》第42卷第5期，1946。

目 录

前 言（汪龙麟） /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 适） / 1

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先骕） / 58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况（李何林） / 75

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陈则光） / 89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 / 102

近代诗人述评（汪辟疆） / 124

龚定庵思想之分析（钱 穆） / 148

龚自珍简论（季镇准） / 164

读郑珍的《巢经巢诗》——谈五七言诗体的运用问题（缪 钺） / 174

王韬和他的文学事业（陈汝衡） / 179

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葛贤宁） / 187

论黄遵宪的新派诗（质 灵） / 204

晚清诗人黄遵宪（王 瑶） / 212

梁任公先生（郑振铎） / 221

诗僧曼殊——尚留微命作诗赠——有怀末句（丁 丁） / 245

章太炎的文章论（周振甫） / 260

章太炎文学简论（任访秋） / 270

近代女革命诗人秋瑾（肖善因） / 286

台湾诗人丘仓海评传（梁国冠） / 293

关于伪《石达开遗诗》（阿 英） / 315

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徐蔚南） / 318

- 戏曲的更新 (杨世骧) / 322
- 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 (鸿 年) / 343
- 包公传说 (赵景深) / 353
- 欧阳予倩和红楼戏 (曲六乙) / 369
- 川剧作家赵熙及其《情探》 (冬 尼) / 375
- 黄吉安剧作初探 (席明真) / 388
-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 (节录) (志 希) / 398
- 《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 (王 虹) / 401
- 关于《儿女英雄传》 (孙楷第) / 412
- 《花月痕》作者之思想 (刘欧波) / 423
- 《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 (容肇祖) / 431
- 《海上花列传》序 (胡 适) / 441
- 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 (王 璜) / 457
- 李伯元作品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 (海 孺) / 465
- 略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剑 奇) / 471
- 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严薇青) / 476
- 《孽海花》 (增订本) 前言 (张毕来) / 490
- 评《孽海花》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 (徐梦湘) / 497
- 谈鸳鸯蝴蝶派小说 (徐佩琚) / 508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胡适

一

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综括起来，这五十年的重要有几点：

(1) 五十年前，《申报》出世的一年（1872），便是曾国藩死的一年，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但是他的中兴事业，虽然是很光荣灿烂的，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故都不能有长久的寿命。清朝的命运到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切病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到他们的中兴事业。但曾、左的中兴事业，虽然延长了五六十年的满清国运，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满清帝室的灭亡。他的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军，忽然做到中兴的地位。但“桐城—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但曾国藩一死之后，古文的运命又渐渐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更成了“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痼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这一段古文末运史，是这五十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2) 古文学的末期，受了时势的逼迫，也不能不翻个新花样了。这五十年的下半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这段古文学的变化史又可分作几个小段落：

- (一) 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
- (二) 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

(三) 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

(四) 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

这四个运动，在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史上，都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渊源和主张虽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起来，这四派都是应用的古文。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故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但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们便成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文章，应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要算很大了，但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厌。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

这一段古文学勉强求应用的历史，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段。古文学幸亏有这一个时期，勉强支持了二三十年的运命。

(3) 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等等续编，都是三十多年来的作品。这一类的小说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学。到了前清晚年，南方的文人也做了许多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等等，都是有意的作品，意境与见解都和北方那些纯粹供人娱乐的民间作品大不相同。这些南北的白话小说，乃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他的重要远在前面两段古文史之上。

(4) 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旧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民国六年以来的